

美国垄断资本主义辩护士

——阿尔文·汉森的“福利国家”剖视

黄 仲 熊

一、汉森打着“福利国家”的幌子为美国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政策效劳

自从第二次大战以来，靠战争大发横财的美国垄断资本集团越来越加紧利用国家机器作为攫取最大限度利润的工具，从而更加深了美国政治上的反动性和经济上的腐朽性。垄断资本与国家政权结为一体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压榨掠夺政策，日益激起了国内外劳动人民的反抗。美国统治集团为了麻痹国内劳动群众的斗争意志，缓和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革命高潮，极力玩弄欺骗手法。垄断资本集团的政治代理人如杜勒斯、肯尼迪之流居然恬不知耻地宣扬，通过政府的“福利措施”（改进所得税、增加社会保险等），美国已经成为一个比社会主义“更优越”的“全民福利国家”！

配合这种欺骗性的反动政治目的，美国垄断资本的御用学者们，也大肆鼓吹“福利国家”的谬论，说什么由于实现了“福利国家”政策，美国社会已经达到了“各阶层收入的公平分配”、“充分就业”和“稳定持续的经济繁荣”。他们并且广泛搜罗拼凑各种宣扬“阶级合作、阶级和平”的改良主义谬论和反动哲学作为“理论”基础，来鼓吹美国的当代“福利国家”是“人道主义”、“明智的现实主义”（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美国式的“民主政治理想”和所谓“新政治经济学”的有机结合。^①

美国当代著名的凯恩斯主义分子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忠心谋士阿尔文·汉森^②，就是这种“福利国家”谬论的最有代表性的宣扬者之一。汉森把美国在本世纪三十年代经济危机沉重打击下被迫实行的罗斯福的部分“新政”，说成是借鉴于欧洲经验（指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社会保险立法）的美国式的“人道主义改革”。他极力吹捧在第一次大战时期被列宁斥

① 范因：《自由放任和全民福利国家》（1956年英文版），第5—8章。

② 阿尔文·汉森（1887— ）是美国哈佛大学的退休教授，曾担任美国政府的一些重要职务，如国务院经济顾问，美国加拿大经济联合委员会主席，联邦准备银行特别顾问和经济顾问。美国垄断资本集团的喉舌之一——《幸福》杂志曾称赞汉森为“第一次大战后（美国）财政金融和经济政策的主要谋士之一”。认为“他所起的作用愈来愈重要。……今天，谁如果不熟悉汉森和凯恩斯的思想，谁就不可能了解世界大事的推演。”汉森在他的较近的两本分析美国战后经济的著作：《美国的经济》（1957年）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经济问题》（1960年）中，大力宣扬“福利国家”思想和政策，为推行美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政策效劳。

为“疯狂的帝国主义”政治家的美国总统威尔逊，是美国“民主理想”的“复兴者和改革家”。他认为通过威尔逊的“深远的改革纲领”，使美国联邦政府在后来“成为福利国家的全能工具”，树立了所谓“福利国家建筑中的两大基石”，即政府干涉劳资关系的权力和“为新财政政策创造了一架强有力的发动机”——“以累进所得税为代表的广大征税权力”等等。但是汉森更着重指出，只有凯恩斯的“新政治经济学”才教导了美国怎样去利用威尔逊的“民主制度改革”和他所创造的“福利国家工具”。汉森极力吹嘘，“凯恩斯比我们这一时代的任何经济学家更有助于把经济学从它所陷入的消极地位拯救出来，使它再一次成为国民财富的科学和政治经济学的艺术。”^①

我们知道，汉森在三十年代经济危机和萧条时期，追随于凯恩斯之后捏造所谓“长期停滞论”。他诡称由于从本世纪二十年代以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人口迅速增长趋势的停滞或下降，新领土和资源的开发越来越少，大规模技术发明的趋于停顿或暂歇，所有这三方面刺激投资因素的萎缩，使得从十九世纪以来，虽有剧烈的“周期波动”但仍然“繁荣高涨”的资本主义经济陷入了“过度成熟或长期停滞”阶段。于是他和凯恩斯吹起同一调子，认为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如果不凭借国家“民主计划”的“调节”作用，就不可能实现“充分就业”和“稳定的（克服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经济增长”。在引进国家的“调节”作用以后，汉森就大力宣扬所谓“公私混合经济”，这也就是凯恩斯所鼓吹的，通过国家来增加公共支出以弥补私人支出的不足，为垄断资本提供市场保障高额利润的办法。凯恩斯主张打破平衡预算的老传统，运用赤字财政来刺激资本主义经济的“繁荣”。汉森同样鼓吹所谓“补偿性财政政策”，建议充分运用税收、公债、发行通货扩张信用等搜括手段来吸取劳动人民的血汗以满足垄断资本家的利润贪欲。从三十年代以来，汉森的这些策划已充分体现在美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制度的重要经济政策之中；同时也构成了他所鼓吹的美国“福利国家”谬论的主要支柱。

汉森一方面尊奉凯恩斯的庸俗经济学为他的“福利国家”论的指导原理。但是他无法掩饰这样一个事实，作为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死敌，冷酷阴险的大资产阶级代理人凯恩斯是绝口不谈什么劳动者的福利的。汉森供认，“在任何意义上都不能称凯恩斯为福利国家之父”，因为“他不曾挺身出来在工人改革或福利国家的旗帜下战斗。”^②他惋惜凯恩斯没有把自己的经济学在“某种意义上”伪装“成为亚当·斯密心目中确实有过的道德哲学的一个部门。”^③翻成通俗的语言说，也就是认为凯恩斯没有把他赤裸裸地为垄断资本服务向工人阶级进攻的庸俗经济学，涂抹些“人道主义”的、“伦理道德”的脂粉。

为了把拒谈福利的凯恩斯主义和伪装人道的“福利国家”幌子挂上勾，汉森求助于“实用主义”。他说凯恩斯主义者能够接受“福利国家”这个概念，只是为了“调整现存的经济制度”，使它能在“新的情况”下有效运行而采取的一种“明智的现实主义”；所谓明智的现实主义也就是反动的资产阶级实用主义。实用主义是总危机日益加深的情况下，替垂死的资本主义制度寻求出路的保命哲学，也是凯恩斯主义和“福利国家”谬论的哲学基础。抱着这种反动的实用主义目的，汉森鼓吹“福利国家”纲领的某些项目，例如社会保险、失业保

① 以上引文均见汉森：《美国的经济》，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171、162页。

②③ 均见《美国的经济》，第147—148页，第123页。

險制度，既是罗斯福式的“人道主义改革”或所谓“好的社会伦理学”，同时也是凯恩斯主义者认为能给总危机时期的垄断资本主义保障市场和提供“充分就业”的“良好经济学”。

显然，汉森所谓“好的社会伦理学”或“人道主义”，无非是用作掩饰垄断资本向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进行残酷剥削和掠夺丑行的遮羞布；他所谓“良好的经济学”只是美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反动政策实践的代名词。因此不管汉森之流的“福利国家”的“理论”基础是一个怎样七拼八凑的破烂幌子，但是对它加以揭露批判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第一，揭去他的“福利国家”的“人道主义”和“全民福利”的画皮，不但使我们进一步认识了美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反动实质，而且彻底戳穿了现代修正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把“福利国家”的骗局混淆为社会主义来欺骗劳动人民的无耻伎俩。第二，从美帝国主义的执政者和御用学者们近来大肆叫嚣“福利国家”口号的烟幕背后，我们将更清楚地看到一天天烂下去的美国经济和美帝国主义的日暮途穷的纸老虎真象。第三，通过揭穿“福利国家”的骗局和看到它的破产，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美国国内阶级斗争的动向和美国人民的新觉醒。

二、揭穿汉森的“福利国家”

綱領的“全民福利”和“人道主义”的畫皮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辩护士们把垄断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称为“全民福利国家”，把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伪装成“民主的”，超然于阶级斗争之上的“不偏不倚的公断人”，同时颂扬帝国主义国家具有越来越大的“社会保障和福利”的职能，似乎它更加关心穷人的物质生活、教育和健康等等。他们利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社会福利”措施的改良骗局来迷惑劳动群众，但是他们不能完全掩饰这些辩护伎俩的真正目的，在于力图抵制或削弱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对劳动人民的革命影响来挽救垂死的资本主义制度。连美国的某些“福利国家”论者也供认，“鼓吹全民福利国家的主要人物，都希望政府在资本主义秩序的框子以内来进行工作，以避免走向自由放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极端。”^①简单明白地说，也就是要借反对自由放任主义的幌子来加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借美化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来反对社会主义。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理论教导我们，随着垄断资本主义转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国家不仅担任支持和保护剥削制度的职能，而且国家本身就是一个剥削者，它通过直接干预经济生活千方百计地帮助大垄断资本获得高额利润，而给工人造成军事苦役营。但“福利国家”的鼓吹者却企图“证明”帝国主义的国家机器正在“公平合理”地调节着工人与企业主的关系，似乎政府直接插手于经济生活，不只是对资本家有利，而且可以保护工人群众免受剥削压迫和贫困的痛苦，促进“全民的福利”。汉森说什么“政府属于人民。国家不是压迫工具（这是从君主专制时代沿袭下来的国家观念），而是民主时代的人民能够用来解决城市集中和工业化所引起的问题的唯一手段。”^②

① 范因：《自由放任与全民福利国家》《序言》，第1页。

② 汉森：《美国的经济》，第173页。

汉森首先装成反对连他自己也承认早已成为历史陈迹的“自由放任主义”这个虚假的靶子，从而引进国家的“调节职能”，为他的“公私混合经济”找根据。他指责十九世纪资本主义工业化时期的自由竞争、市场经济和个人主义，造成了“私有企业观点和社会福利观点的冲突”，“造成一个日益堕落的社会”。^①按照他的说法，“两次大战期间，对整个西欧和美国来说，是一个过渡时期，是从十九世纪的经济自由主义过渡到‘福利国家’……，是从个体经济过渡到以社会福利为重点的公私混合经济”。由于有了这种混合经济，现在美国似乎已经达到了一个“真正文明社会”的标准，即一切经济活动都要通过“社会价值判断”，而不是完全由市场来支配。他所谓“社会价值判断”就是考虑保障社会“公平分配”、“彻底消除贫困”、培养人民的“文明思想习惯”等“伟大目标所遵循的法则”。让我们剥开画皮看一看，汉森所谓以社会福利为重点的公私混合经济，究竟是哪些人的福利？究竟什么是“公”什么是“私”，二者怎样地“混合”？他的所谓“社会价值判断”和“伟大目标所遵循的法则”又是一种什么“好的社会伦理学”或“道德哲学”？现实的美国社会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真正文明社会”？

应该指出，“混合经济”的发明权不能归之于汉森；这种谬论早在十九世纪末已由德国“国家社会主义”者和英国的“费边派”打响了开台锣鼓。到了资本主义总危机时期，特别是从凯恩斯主义出笼以后，“混合经济”的调子就越唱越起劲。它的鼓吹者们假装把资产阶级政府同资本主义私营企业对立起来，然后转弯抹角地主张，用各种各样的“折衷办法”使国家政权同私营企业的“进取精神”（应读作追逐利润的精神）合作，以保证企业主获得“应有的报酬”和经济制度的“正常运转”。汉森宣扬“混合经济”时却把话说得比较明白，他直截了当地说出，公私混合的“福利国家首先是一个收入的再分配者和私人企业产品的巨大购买者”；“政府只须支出大批经费，事情仍由私营企业来做”。更明确些说，他的所谓混合经济就是动用政府的国库资金来大量收购资本家的滞销存货的一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制度。

我们知道，通过国家的立法和预算，把很大一部分国民收入作有利于垄断资本组织的重新分配，也就是说，利用国库资金，利用人民缴纳的税款和不断发行巨额公债，向私人垄断资本集团采购、订货，来保证他们获得最大利润，这是当代国家垄断资本为垄断资产阶级服务的一个主要方式。这种方式在美国通过汉森式的“公私混合经济”和“新财政政策”得到最充分的运用。

例如，由美国政府利用国库资金向私营企业购买的不包括劳务在内的物资（绝大部分是军用物资）在第二次大战年代（如1943年和1944年）约占全国私人 and 政府消费总额的43%；在侵朝战争时期（1952年和1953年）也占消费总额的20%左右。平常年份国家采购额虽在10%至15%左右，但应该看到的是，这个数额平均将要接近美国联邦政府预算支出总数的一半。如此巨额的采购资金从何而来呢？主要是依靠征税和举债向劳动人民的血汗工资搜括得来。1963年美国各级政府共征收了总额约一千五百亿美元的各种苛捐杂税，其中联邦政府就征收了一千零六十亿美元，创美国财政史上征税额的空前记录。平均全国居民每人要负担八

① 汉森：《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经济问题》，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53、103页。以下凡未注明出处的引文，均引自汉森的《美国的经济》及这本书。

百三十多元的税课。但是由于美国政府的不断扩军备战，向外侵略，政府采购商品和劳务的开支（绝大部分是军费开支）有增无已，因此财政收支几乎年年出现赤字。1963财政年度赤字高达63亿美元。1964财政年度原来估计预算会出现五亿美元赢余，但执行结果却出现了82亿美元的赤字。为了弥补赤字依靠发行大量国债，1963年一年之内，美国国债的最高限额三次突破。最近约翰逊在他的预算咨文中表示，他不久又将要求国会把现行的三千二百四十亿美元的国债限额再加提高。公债支付的庞大数目的利息也取之于税收。美国现在的公债利息已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整个联邦预算。

汉森在1938年美国经济学会年会的一篇演说中，对他鼓吹用征税和举债的所谓“新财政政策”来筹措“公私混合经济”所需的巨额资金，是否会在同时挫伤“私人投资的积极性”？还表示犹豫，他当时认为这是将来经济学家需要大绞脑汁的问题。^①可是大战期间和战后美国加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采购措施的经验，使他的疑团一扫而空。他非常满意地认为，政府通过赤字财政方法直接对私人企业实行大量订货，是比依靠市场价格方法（包括政府采取公共工程等措施）来加强资本主义经济有力得多。汉森向垄断资本家打包票说：“货物是从私人企业手中采购的。因此私人企业能同总国民产值按大致相同的比例继续发展。福利国家并不在任何感觉得到的程度上替代私人企业制度。相反，它使私人企业更加强大，更加运用自如”。

非常明显，汉森在这里所说的“私人企业”指的是最大的垄断资本企业。美国政府采购订货的直接对象（特别是军事订货），总是为数很少的一批大垄断企业公司。政府同它们按最优惠的条件议定价格，排除了市场价格的竞争和中小资本家的分沾余润，从而保证获得稳妥可靠的最大限度利润。约翰逊还在去年的国情咨文中就眉飞色舞地吹嘘美国“繁荣和富足”的凭证是：美国公司利润连年“很突出地”增长着，“从1961年初的年率三百八十五亿美元增加到1963年底的大约五百五十亿美元”。1964年美国各大公司又获得了破记录的利润。难怪汉森早就为此而喝采说，美国公私混合的“经验证明，……利润之大，即使最乐观的人都梦想不到”！

由此可见，汉森所谓“以社会福利为重点的公私混合经济”，其实只是以垄断利润为目标的、假公济私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如此一个“福利国家”对垄断资本家来说，的确是有福有利的。可是汉森却硬要歪曲证明这样的“公私混合”是“大公无私”的，这样的社会福利是“全民的福利”。据他说，工人纳税，资本家也纳税。增加税课，对资本家固然是好事，对贫苦的人民也不是坏事，甚至他们享受的好处比资本家还要多！他的“理论”根据是：第一，作为美国“税课结构的核心和堡垒”的累进的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是保持“民主社会所必要的手段”，是实现“福利国家的有力工具”。他说，如果没有累进所得税，社会财富和国民收入就会变得越来越不公平，而且由于收入过分集中在富人的手中，“社会消费倾向”将要减低，商品滞销，失业增加，这对资本家和工人都有不利。第二，他宣扬“现在所处的情况下，一元的边际税课显然能够提供比一元的边际工薪袋收入更高的社会效用。”意思无非是说，工人每缴一元钱的税所享受到的社会福利，比这一元钱由工人自

① 汉森：《经济的进步和人口增长的下降》，见《商业循环理论论文选读》（英文版），第382页。

己来消费的价值要大得多！

这两条论据都是汉森从凯恩斯、工党改良主义者和所谓“福利经济学家”那里贩来的货色。首先，通过所得税的征收来“平均”社会各阶层收入的说法，完全是骗人的鬼话。美国的所得税制本来就是以劫贫济富为其特征的。所得税的负担主要落在劳动人民身上。微薄的工资是他们收入的唯一来源，也是他们负担税课的唯一基础。美国政府为了搜括更多的人民财富，和把税收的负担加在广大的劳动人民身上，不断降低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1913年是三千美元收入以上，1964年已降低到六百美元以上）目前纳税人已增加到六千万人（第二次大战前夕的1939年还只有三百九十万人）。几乎包括了全部就业人口，所得税实际上变成了人头税。再加上各种间接税，工人收入的三分之一全被税收吸血器吸去了。至于那些以利润、股息、红利、地租等为其主要收入来源的豪富们，则享有种种免税、减税的优待和公开逃税的方便。据美国研究劳工问题的某些著作揭发，美国的富豪们逃避交纳他们应交的所得税的三分之一以上的税款。就是他们已交的税款，也会通过各种门道如提高国家订货价格，发给补助金，廉价购买政府“剩余物资”等办法，重新流回到自己的口袋中来。但工资收入的劳动人民则不得不按他们的课税收入十足交税。为了玩弄这种劫贫济富的掠夺手段，汉森一方面在口头上竭力主张累进税（实际上所谓累进所得税却大大降低了起征点而不利于劳动人民），另一方面他又提出一系列减免资本课税办法的建议，以便保障垄断资本家获得高额利润。^①他的这些反动主张在第二次大战期中和战后的美国税收政策中几乎得到全部的贯彻。但是汉森并不以此为满足，他还主张，随着对“公共服务”的需求的增长，将不得不用增加销售税（主要由劳动人民负担的消费税）来作为所得税的补充。

汉森这些人把税收说成是促进公平分配的手段，实际是替美国政府迫使人民为垄断资本集团牟取暴利作出牺牲施放烟幕。因为美国资产阶级不仅通过剥削劳动者，而且通过国家财政的重分配手段，攫取了国民收入的一半以上，但他们的人数只占全国居民的十分之一左右；何况在资本家阶级中享受特优厚利的，更只是一小撮的豪门财阀。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鲍尔丁说：“收入再分配的问题不是把富人的收入再分配给穷人，而是把工资获得者（生产者）的收入再分配给没有获得这种工资的人（非生产者）。”^②可见资产阶级学者主张用税课来平均收入的主张，实际上只是不许触动垄断资本利益的改良主义欺骗口号。

至于汉森捏造“全民福利”的第二个论据，即工人们交纳的税款为他们提供了“价值”大得多的“社会福利”的说法，也正是垄断资本家通过他们的政治代理人在总统的竞选演说、国情咨文、预算咨文、经济报告等等之中，重复了不知若干次的欺骗人民的陈词滥调。如果把汉森吹嘘的什么“福利国家”纲领就是“意味着”在美国“一劳永逸地消除贫困”，

① 汉森主张公司所得税不应课征于利润的全额，而应首先减除资本家拟用于新投资的部分。未分配利润即使不全部免税，至少也应减低其税率。他还主张在战争停止以后立即停征战时超额利润税，主张应允许资本家企业从其实现的利润中扣除过去的和预期未来年份的“亏损”。此外还提出应允许资本家加速其固定设备的折旧提成。以上参见汉森和佩洛夫合著《州财政与地方财政在国家经济中的地位》（英文版），第256—259页。又见汉森：《经济政策和充分就业》，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49—151页，第188—190页，第240—241页。

② 鲍尔丁：《经济政策原理》，第235页。转引自查果洛夫主编：《现代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经济理论批判》，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318页。

给美国“十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社会底层人口”以“更多的教育、更好的房屋、更好的医疗、更充分的失业救济金和老年保险金”等等甜言蜜语^①，以及美国官方文告中关于扩大“社会福利”的国家支出的空洞诺言，同总统们的实际“政绩”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到，美国劳动人民缺乏最起码的福利的悲惨情景，恰恰揭穿了这些统治者及辩护士们的漂亮的谎言。肯尼迪在1962年的国情咨文中，假仁假义，说什么“为了帮助所有的（美国）人中最不幸的人，将建议一项新的公共福利计划”，但是在他的咨文中列在“卫生、劳工和福利”项下的开支，只不过占全部预算开支的5.2%，而用之于军费的钱却占整个开支的80%。约翰逊在1965—1966年度预算咨文中大肆宣扬要准备增加用于教育、保健、住房及其他“福利”经费，总共不超过全年税收的7%。而在汉森称之为“真正文明社会”（约翰逊称之为“伟大社会”）里的劳动人民，究竟享受着怎样的教育、医疗保健、住房、社会保险和失业救济等“社会福利”呢？

首先从教育来看，美国文盲的数目将达一千万人，失学儿童达四百万人以上，每年约有一百万中学生，40%的大学生因缴不起学费而被迫停学（这还是官方宣布的数字）。但是美国的教育经费在整个国家预算中只占极小比例，如1963财政年度联邦政府的教育开支只有军费的2%。美国大城市中的许多学校是设在远离贫民区的地方，工人子弟根本无法上学。

其次，在医疗保健方面，美国缺少近百万张普通病床和必要的医疗设备，但联邦政府仅根据一项临时法案，一年支出一亿多美元的微小金额，来补助全国各地建立医院。美国的医疗手术费是惊人昂贵的，最简单的阑尾切除手术需费175—200美元，拔一颗牙需50—60美元。但美国一直没有公共健康保险而只有私人保险，后者只支付被保险病人的部分住院费和普通药费，手术费由病人自付。而且私人保险公司的保险费是工资收入的劳动者所付不起的。在第二次大战以后，美国历届政府由于政治上的欺骗目的而提交国会讨论的国家强制健康保险法案，以及最起码的老年医疗照顾法案，也因为遭到垄断资本的坚决反对而通不过。

再看看贫民的居住条件，根据美国官方缩小了的统计，美国那些破烂骯髒、暗无天日的贫民窟，占全国城市居民区的20%，贫民区的人口占全国人口的33%。在历届总统竞选把戏中，都所谓清除贫民窟的计划。但是连汉森自己也不得不透露，按照“1940年住宅调查”大大缩小了数目的七百万所贫民棚屋，和两次大战间的二十年中每年只拆除四万所旧房的进度计算，清除美国现有贫民窟至少需时二百年，“还没有计入每年废旧房产的净增加数。”^②据美国参议员保罗·道格拉斯供认，“贫民窟正在以比我们（美国人）消灭它更快的速度在大多数城市中蔓延着”。

最后看一看被汉森大吹为美国“人道主义改革”的社会保险。美国在三十年代经济危机时期，由于劳动群众反饥饿斗争的强大压力，被迫在1935年才迟迟实行的社会保险，现在包括老年、遗族和残废保险，失业保险，社会救济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保险，一对退休的工人

① 汉森一面瞎吹什么“美国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到了梦想不到的舒适和奢侈程度”，但同时却不得不半遮半掩地承认，仍有居住在贫民窟里的“十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社会底层人口”，穷得“买不起他们所需要的物质产品”。汉森大大压低了美国贫困人口数目。据美国前总统经济顾问凯塞林的估计，美国贫困人口约有7,700万人，占人口的五分之二。

② 汉森：《经济政策和充分就业》，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75页。

夫妇按照规定的许多苛刻条件,所能领到的补助金,仅能维持美国劳工部调查的最低生活费(两夫妻年约三千美元)的21%至51%。年满65岁以上的单身工人平均每月只能领到84美元,但是他的最低生活费每月至少需150美元。一个遗族寡妇平均只能领到年救济金810美元。所有这些领受救济金者都无法维持最低生活。失业救济金额最多也只好维持四口之家的必不可少的开支的56%至78%。失业救济按规定期限(最多的也只能领到二十几个星期)领完而仍未找到工作的可领公共救济金,但数目不到失业救济的一半,而且主要是用美国剩余农产品中的霉烂粮食,进行施舍的性质。越来越多的长期失业者由于无法维生,被迫卖血和自杀。但即使这样微不足道的“救济”,从申报到批准也要通过百般刁难的手续。美国《进步劳工》杂志刊登了一篇叙述领取工人遗族补助金者的遭遇的文章,就用了这样一个讽刺性的标题——《这是福利还是战斗》!

除了公共救济是乞讨性质的廉价的施舍以外,老年、遗族、残废保险基金是由劳资双方各按工人工资额(工资年收入的第一个4,800美元)3%稍多一点的税率交纳的“社会保险税”来筹措的。失业保险金是名义上由企业主按工人工资总额交纳的“工资税”来筹措的。但实际上资本家的税负准许转入成本,通过提高货价的方式,仍然转嫁到劳动人民身上。因此,所谓“社会保险”实际上不过是随时有被解雇可能的在业的劳动者节衣缩食,给失掉了工作或丧失工作能力的劳动者及其家属来维持一个半饥不饱、不死不活的状态。这算得是什么“福利国家”什么“人道主义”!

总之,即使从上面所列举的部分情况来看,汉森说什么工人每交一元钱的税,就能享受到比一元钱收入更多的社会福利,全是骗人的鬼话。同时还应该看到,单凭美国政府的“社会福利”支出的数目大小,仍不能完全揭露所谓“全民福利国家”的阶级实质。实际上,在汉森说的什么“人道主义”、“道德哲学”、“伟大目标所遵循的法则”等每一句谎言背后都包藏着别有用心目的——为垄断资本专政的社会经济的、政治的、甚至军事上的利益而考虑的目的。

例如,当汉森谈到要发展教育的时候,他以退休大学教授的身分,竭力强调教育的重要性,说什么“没有教育,民主制度就不能存在,人民就要灭亡”等大话,但接着却不得不透露要发展教育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满足有高度文明的福利国家的需要,劳动力应该是受过教育的劳动力。物质部门越来越需要有训练的技术人员,而一般劳动者则在减少中。”从这里可以看到,“福利国家”需要发展教育,只是为了适应美国工业自动化趋势,为资本家在每一个工人身上剥削更多剩余价值,繁殖必要的、能够更熟练地操作机器的劳动力。这种主张正是近年来流行于西方庸俗经济学中为垄断资本服务的所谓“教育经济学”的反动货色。^①

汉森还用传教士的口吻表示,美国“福利国家”应以“社会良心”的名义同“贫乏、疾病、愚昧无知和不卫生的共同敌人”作斗争,他特别对所谓社会“底层人口”的“道德堕

① 美国的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国家预算对教育的开支,看作是一种“教育的投资”,认为能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技术,提高劳动力生产率。从而不仅能增加劳动者的收入,而且对整个国家来说也增加了社会产品和国民收入。实际上这是一种彻头彻尾为垄断资本加强剥削工人阶级服务的谬论。参看《人民日报》1964年10月18日《学术动态》。

落”和身心健康状况的恶化“深感忧虑”。据他说，由于贫民窟的继续存在，由于拥挤在大工业中心的棚屋、廐舍和地下室里的“底层人口”缺乏“正当的娱乐和社交”；没有“足够的公园和游戏场所”，为他们“提供生活乐趣”！因此“产生了精神失常和社会失调”，以至犯罪案件特别是青少年的犯罪率年年上升。汉森的这种“关怀”和建议大概很合他的主子们的胃口，因此约翰逊在今年的国情咨文中也厚颜无耻地鼓吹说，“三百多年来，美国的美景一直陶冶着”美国公民的“精神”，“扩大”他们的“眼界”，所以美国政府将“比以往任何时期兴建更多的大大小的公园，开辟更多的海滨公园和空旷的场地，作为将来的绿色遗产。”

这不禁使我们记起马克思提到过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老祖宗——英国人威廉·配第在二百多年前，主张为了资产者的利益，应该为救济“窃贼公开征收一种特殊的捐税，因为……为窃贼纳捐比让窃贼来搜括好些。”^①

现在美国这个“福利国家”居然能让“精神失常的犯罪者”和“上流人”共享海滨公园的“绿色遗产”，使前者的“精神”状态得到“陶冶”和“感化”，从而使有产者免受窃贼的“搜刮”，这岂不表明美国这个“伟大的社会”的“道德哲学和文明标准”已提高到不可思议的境界了吗！可是汉森的疏忽却使他和约翰逊都露了马脚，他为了要强调美国犯罪率的上升而说溜了嘴，不顾自相矛盾地顺手从《纽约时报》引了这样一句话：“人们都说在天黑以后进中央公园很不安全”！既然公园和犯罪之间的“逻辑联系”走到了他们的“文明理想”的反面，那么总统国情咨文说什么“要比以往任何时期修建更多的公园”，只不过是借此为理由向美国人民伸手再多要一笔捐税而已。

至于说到“福利国家”要提供“更好的医疗保健”，汉森提出的理由就比较不是那么转弯抹角的了。他很有根据地指出说，美国“青年总数中身心条件不合于兵役要求的人的比重之所以特高的一部分原因，也显然在于底层十分之一人口在生活上的不利的经济社会条件”。他引证了杜鲁门在1945年给国会的咨文说明，从18—37岁兵役登记的男子中，约有30%的人因体格不合而不予接受。就是那些实际接纳入伍的人中，后来仍有150万人除籍；此外还有150万人因入伍前患有疾病和有生理缺陷而须在军役中治疗。从汉森和他的主子们看来，这种情况的确是严重的。如果在“底层十分之一人口”中竟找不到足够的合格的兵役青年，谁来充当“特种部队”（世界宪兵）为美国“福利国家”去开拓“新边疆”呢！

由此可见，汉森关于“福利国家”的什么“全民”福利、“社会伦理”或“道德哲学”、“人道主义”等画皮是不堪一揭的。但是这种谬论的鼓吹者硬把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殉葬衣，当作文明大礼服来伪装日益法西斯化的美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正如前面所说的，是由于他们极端害怕社会主义和阶级斗争，害怕拉紧套在美帝国主义脖子上千万条绞索的全世界人民的革命运动。

我们知道，美国那些脑满肠肥的垄断资本财阀们对于社会主义这个不可阻挡的历史洪流，一向怀着无比恐惧。他们有的甚至神经过敏地怀疑资产阶级的“国有化”，改良主义的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75页。

社会福利、社会保险等措施，也会通向“马克思的社会主义”。^①因此汉森这个美国垄断资本集团的谋士不得不进行两重工作。一方面，他向他的主子们拍胸担保，“福利国家不是社会主义”，示意他们要象英国的保守党“大胆支持”工党的“福利国家方案”那样，尽可能装得“开明”些。据说这样一来，劳资关系就“健全”了，“阶级斗争不再成为问题了”。另一方面，他把工人阶级通过斗争，迫使资本家作点滴让步而获得的某些福利改良，诡称是“福利国家”（垄断资本专政）的“人道主义改革”，大肆鼓吹，借以麻痹劳动群众，妄图缓和阶级斗争。

但是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美国国内的阶级斗争不仅没有如汉森之流所希望的那样“成为过去”，而且如我们在下面将要谈到的，斗争的形势正有新的发展。更使美国统治集团感到胆颤心惊的是亚非拉地区的革命运动不断高涨。汉森惊呼：“叛乱、革命、暴动——正在非洲、亚洲、近东和拉丁美洲沸腾——要求我们（美国）加以注意。它们的问题最后已经变成我们（美国）的问题。……这是一个压倒一切的问题。当进入20世纪后半叶的时候，这个问题将越来越无情地屹立在我们（美国人）的面前。”

三、汉森的“福利国家经济学”能创造“消除经济危机”导致“充分就业”的奇迹吗？！

面临着社会主义胜利时代如火如荼的世界人民革命斗争和美国工人运动的新觉醒而发抖的汉森之流，眼看“福利国家”的所谓人道主义外衣有彻底被撕破的危险，于是换了另一种歪曲手法。他们故意把工人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同经济斗争割裂开来，似乎改良主义的“福利国家”本来就是工人运动既定的斗争目标。汉森用故作“明智派”的口吻说，“人道主义在十九世纪后半期得到发展，但这并不是由于那时人们的本性变得比以前仁慈一些。绝对不是这样，事实是，当时上层阶级由于来自下面的压力不得不采取行动。各劳动阶级在他们的发展过程中已经发展到了要求发言权的地步。从这种要求的汹涌巨浪中，福利国家已经成长起来”。据他说，工人阶级的政治影响不断增加以后，“他们就要求重新分配收入，要求累进课税，要求社会保险，总之，要求一个福利国家”。

按照汉森的歪曲说法，“福利国家”既然是工人们自己要求建立的，美国“上层阶级”的资产者也不过是由于“认清了历史潮流”，采取了“明智的现实主义”态度，尊重工人们的政治影响和发言权，从而承认和接受了他们的斗争成果。美国的上层资产阶级怎么会变得如此“明智”呢？汉森认为这不能不归功于两个“伟大历史人物”：经济思想家凯恩斯和经济改革家威尔逊。汉森在这里搬弄现代最腐朽反动的美国“实用主义工具哲学”的谬论，说什么凯恩斯“决不是唯物史观的信徒。他相信思想的威力。他相信他的言论著作极为重要……。他相信一个人掌握了思想能够左右历史的进程”。与此同时，汉森大肆吹捧第一次

① 美国商会会长约翰斯通曾责难政府在社会保险方面花的钱“比原子战争还要恶劣”，他要求取消联邦预算中有关“社会改良”的项目，认为那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见乔治·席斯金德：《凯恩斯主义和美国经济危机》，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第49页。）

大战时期的美国总统威尔逊是美国“民主政治”的化身，是“保守的改革家”，说“他一旦成为实际的政治家，就以惊人的灵活性来适应面临的现实。他相信能在现存社会秩序的轮廓内进行合适的调整。但他也深信，如果不作这些调整，美国的民主理想就危险了”。所有这些谬论都只不过为要证明他在前面一再提到的一种说法，美国的“福利国家”不仅是罗斯福式的“人道主义改革”和西欧的社会保险制等经验相结合的产物，从而是一种“好的社会伦理学”，而且它也是凯恩斯的“新政治经济学”和美国“民主政治的改革”相结合的产物，因此它又是一种“好的经济学”。据说它不仅“改善和提高”了美国工人阶级的经济和政治地位，而更重要的是，“福利国家”纲领仿佛还能医治美国经济制度的痼疾和癌症——危机和失业，给它恢复新的生命力！

以下让我们再来拆穿他的西洋景看一看，“福利国家”纲领的“良好经济学”究竟能给一天天烂下去的美国经济创造些什么“奇迹”吧。前面提到，当美国在三十年代遭受到一次最沉重的经济危机的袭击时，汉森曾垂头丧气表示资本主义世界已进入了“过度成熟的长期停滞”阶段。但自从第二次大战及战后的侵略扩军给美国经济造成一些暂时的虚假繁荣景象以后，汉森又不禁洋洋得意起来，似乎在美国出现了“有史以来的奇特和十分新鲜的经验”。他吹嘘：第一，从1938年以来，美国没有发生过象三十年代那样重大的经济萧条；第二，从1941年以来，美国经历了“近乎连续的充分就业”。他认为“福利国家”对这两大“奇迹”的创造都起了“决定性作用”。

首先，汉森大肆吹嘘“福利国家”纲领中的累进所得税、社会保险支出、农场补助计划等，为防止周期波动发展为深刻的经济萧条而配备了大部分的“自动稳定器”。它们的作用在于通过政府的财政政策，把全国居民和企业纳税以后的货币收入控制在相对稳定的水平上，使社会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在经济繁荣时期自动缩小，而在出现衰退现象时，迅速扩大，借以抵销周期的剧烈波动。据说这样就能消除经济危机。汉森把这些国家垄断资本的财政措施比拟为防止机车出轨的“自动煞车装置”或减少震动的“弹簧气垫”。他主张，按照“有伸缩性”的累进税率，所得税在经济繁荣时期随国民收入的迅速增长而上升，就能起着抑制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和防止过度投机的作用。相反的，在经济开始衰退阶段税收倾向于下降，避免削弱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失业保险基金在“充分就业”时由工资税的征收而大量增加。相反，在失业增加时就发放津贴使失业工人获得收入，以维持消费数量和减轻经济活动的下降。农场补助方案规定在农产品价格下降时，联邦政府收购过剩产品，支出大量货币以增加“农民”的收入。当通货膨胀来临价格上涨时，政府抛出库存农产品而吸收货币，紧缩社会购买力等等。有了这些“稳定器”，据他说经济周期幅度升降过大的现象就可以“大大地缓和”。

实际上，所谓“自动稳定器”究竟有多大的稳定作用呢？就拿汉森吹嘘最力的失业保险来看，在美国的前两次经济危机期间，全年平均失业人数即使根据官方统计也接近五百万人（还不包括半失业者），损失工资每年在二百亿美元以上，而发放失业救济金每年不过三十多亿美元，远远不能抵补因失业增加而缩小的劳动人民的收入和社会购买力。何况美国当前的失业增加已经不仅是经济危机时期的现象，而是发展为长期增长的慢性症。因此发放失业救济金并不能对不稳定的日趋缩小的国内市场起什么稳定作用。相反，失业救济金的发放数目愈是迅速增加，就更加预示着经济危机的风暴即将来临。同样，每年由预算拨款数十亿美元的农场补助计划也无法阻止美国长期存在的农业危机的深化。因此，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者

也认为,即使在所谓轻微的经济“衰退”中,“自动稳定器”顶多只能起一些非常“有限的缓冲作用”。汉森自己在吹嘘了一阵“稳定器”的作用之后,也不得不承认,美国实际上虽然配备了“衰退时期的减税、增加复员军人的津贴、补充失业保险金、联邦住宅建筑计划以及增加公共工程和军费支出等内在稳定器”,但仍然发生了战后的几次“衰退”(危机)。他半吞半吐地说什么“我们(美国)已经克服了一些大的萧条,但经济周期仍然没有离开我们,而且它正在国内国外的许多方面提出许多困难问题。”

其次,汉森力图“证明”,美国在第二次大战后的经济周期变化不但没有发展为三十年代那样的经济危机和萧条,而且还似乎“保持了充分就业”水平。他认为这是由于国家采取了“充分就业政策”(包括上述的“内在稳定器”)的结果。汉森并且强调说,“福利国家成了建立充分就业计划的坚实基础。”我们知道,所谓“充分就业”是凯恩斯主义者针对资本主义总危机时期存在的大量经常的失业现象所捏造的一个蛊惑性的口号。在总危机时期,由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进一步尖锐所造成的市场萎缩、企业生产开工不足,千百万工人经常处于失业和半失业状态。凯恩斯歪曲失业的真正原因,认为是由于什么“心理规律”的作用所造成的私人消费需求的不足。如果辅以国家的公共支出来创造足够的“总额需求”(足够的国内市场),似乎就可以达到“充分就业”。第二次大战前后,越来越多的资本主义国家借着“充分就业政策”的幌子来加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欺骗失业的工人群众。

在第二次大战期间,美国由于开动了巨大的战争经济机器和征兵入伍,暂时缓和了大量失业现象。战后美国统治当局继续进行扩军备战,想依靠国民经济军事化和“局部战争”来逃脱经济危机,但失业始终是一个越来越严重的问题。汉森追随凯恩斯认为,提供“充分就业”必须有足够的“总额需求”。他不得不首先承认,最近二十年来美国尖锐的市场矛盾是主要依靠战争和备战来缓和的。他说在战争发生以前,即到了1941年,美国经济已经拥有“极大的潜在生产能力,所缺乏的只是足够的产品销售市场。战争提供了这一市场。”最初是第二次大战,“跟着是朝鲜战争,再后是冷战”,给美国企业提供了“空前的消费品市场和资本财货市场。”但是尽管如此,汉森仍不能不发出感叹,“我们(美国)已经解决了大量失业,但失业仍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我们恳切地要克服这个难关,可是事实上却没有一个容易的解决办法”!

汉森的自嗟自叹其实包含着一种难言之隐。那就是目前美国依靠如此巨大的军事开支,仍然达不到他们所谓的“充分就业”(顺便指出,为垄断资本服务的汉森之辈为了便于他们的主子压低工资,破坏工人的团结,认为在美国经常保持二三百万人失业并不违背“充分就业”的概念)。而且老是依靠战争和军备,同“福利国家”的招牌也很不相称。于是汉森装出一幅明智派的伪善面孔,说什么如果“永远指望用大量军事支出来保证持续的充分就业”,那就“真该悲观了”,就“太不幸了”,“问题在于选择哪一条道路”。

但是汉森面对着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的尖锐市场问题,却没有什麼好的道路可以选择。他为了要解脱他关于“福利国家是建立充分就业计划的坚实基础”的论点,同美国主要依靠国民经济军事化来企图逃避危机这一事实之间的矛盾,不得不再一次搬出所谓“混合经济”的法宝。不过这一次不是所谓“公——私”混合而是“战争——福利”混合经济。一方面他假装承认“国防和对外援助(应读作对内镇压和对外侵略的军事支出),同长期社会福利预算的巨额赤字扩充发生了矛盾”,但接着却露骨地主张,在所谓“看不到未来世界和平前景”

的条件下,美国的“国家安全”应放在第一位,决不能缩减军备。不过据他说,“在有着丰富资源和财力的美国”是既能优先保证军备扩张,又能倚靠发展福利国家的学校、医院、公共事业等优先的社会需要来“为物质产品部门开辟很可观的新市场”。由于这个大炮加奶油的“混合经济”的理论根据实在太蹩脚了,因此连汉森的凯恩斯主义者同行也用嘲讽的双关语气指出,美国的“实际活动家(大垄断资本家 和他们的政治代理人)一想到‘福利’(welfare)就会首先想到战争(warfare)”,从而“基于人道主义的福利国家就势必流产”。^①事情很明显,垄断资本家感兴趣的,决不是什么社会福利而是最大限度利润;能给美国垄断资本带来最高额利润的正是军备生产。^②因此,汉森所“选择的道路”不是什么能保证“充分就业”的稳妥途径,而恰恰是使他吹嘘的“福利国家经济学”陷于绝境的死胡同。

此外,我们还知道,在资本主义总危机时期由于市场矛盾尖锐和发展不平衡性的加强,大垄断资本集团追逐最高利润的竞争更加剧烈化了,它们追求设备现代化和生产自动化来提高劳动强度和剥削率,这就大大加速了工人被机器排挤出来的过程。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这种现象称为“技术失业”。美国总统经济顾问阿克雷曾透露,美国现在的这种“技术失业”年达二百万人。这也是构成美国日益严重的失业现象的一个方面。

十九世纪产业革命时代,西方的庸俗经济学者捏造所谓“补缺论”来掩饰机器排斥工人的失业现象,认为机器从一个生产部门排挤出去的工人,可以被其他需要更多工人的部门(特别是生产新机器的部门)所吸收。汉森套用这种诡辩来企图论证他关于“福利国家是建立充分就业计划的坚实基础”的论点,说“技术和自动化冻结了物质产品部门的就业量——实际上迫使它下降了。服务部门吸收了全部增加的劳动人口。”他还具体举出“在从1947年到1957年的十年内,……尽管物质产品生产的就业量有所下降,公私服务领域却有了增加,足以大体上提供充分就业。”汉森把近年来美国服务行业(包括商业、金融业、公私服务业等非生产性行业)就业有所增加这个资本主义腐朽寄生性加深的现象,说成是发展“福利国家的意义所在”,这也就进一步暴露了他所谓“福利国家”的实质,是力图替一天天腐烂下去的美国经济进行粉饰。

同时,汉森的这种诡辩也暴露了他的自相矛盾。他一方面说从1947年到1957年服务行业的就业增加不但吸收了物质产品部门的失业人口,而且足以“提供大体上的充分就业。但在同一书中他又不得不承认,“在1948年到1959年的战后时期中(朝鲜战争的几年除外),失业者平均占劳动力的5.1%。这就意味着三百五十万工人(还有大量的半失业)……或意味着八百七十五万人口(包括被抚养人口在内)没有谋生之计。”

汉森宣扬什么“福利国家是建立充分就业计划的坚实基础”,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的无稽

① 栗原:《汉森教授论美国经济革命》,见英国《经济学季刊》,1958年9月号。英语中“福利”和“战争”二字语形和语音都很相似,栗原借此嘲讽汉森的“战争与福利混合经济”。

② 据估计美国军火企业公司的利润率几为所有大小企业的平均利润率的十倍,为大公司的利润率的一倍半至四倍。(见苏绍志:《美国是最畸形的军事化经济的国家》一文,载《经济研究》1964年第8期。)又根据一个有资格的美国军火商代言人威登堡姆(曾任美国波音飞机公司和通用动力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所写的一本《美国的军需市场》的小册子,通过统计分析总结了七点理由,认为不论从生产和销售方面来看,军火市场都是独一无二的最理想的垄断市场。

之谈。事实上，不但“福利国家”提供不了充分就业，而且恰恰相反，严重的失业浪潮越来越汹涌地冲击着美国这个所谓“福利国家”的基础。从1959年到1964年上半年为止，美国每年平均全失业率，即使按官方的统计，也已经不是如汉森所说的5.1%，而是上升到5.7%以上。若根据美国资产阶级学者的估计，则失业率已高达8—10%，即美国全失业人口至少已达八百万人。肯尼迪在1963年初就承认美国的失业问题是国内的“头号经济问题”。同年六月的一期《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也认为要在1964年实现“充分就业”，大约需要提供五百万个新的职位。“没有一个官方机构敢于设想这样大的就业数字，除了战争以外是不可能提供所有这些职位的”。应特别注意的是，美国失业问题的严重性不能单从数量方面来看，还应估计那些连美国官方及其宣传机构也认为不容忽视的事实。那就是被称为“爆炸性的”、“美国国内动乱的基本原因”的黑人失业和青年失业的越来越高的比重；此外还有象轮癣一样在美国的心腹地蔓延开来的“长期萧条区”的失业贫困问题。这种地区从1958年的89个增加到1961年3月的101个。约翰逊在去年上台伊始大吹大擂地提出“向贫困开战”的一些咨文和九亿七千万美元的拨款计划，据说是针对着这些紧急情况所采取的措施。但是连美国《斯通周刊》在评论这些计划时也指出：“如果这十亿美元在一年内分配给三千五百万穷人，那只为他们每人每年增加收入不足三十美元，即每周约零点六美元”。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可见，汉森所谓“福利国家”是“好的经济学”的吹嘘，正如“好的社会伦理学”的谎言一样，碰在残酷的美国经济现实面前，就象肥皂泡那样破裂了。因为只要保存着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制和垄断统治，垄断资本家就必然不顾一切地追逐最大限度利润，从而导致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日益尖锐。片面畸形的技术发展及追逐垄断利润的投资狂热造成生产能力过剩和开工不足，劳动人民贫困化加深和失业不断增长影响着消费市场的日趋虚弱，是这一基本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生产设备能力过剩与社会消费能力萎缩之间的日益扩大的鸿沟；饮鸩止渴的扩军备战，杀鸡取蛋的税课和消费者信贷，火上加油的通货膨胀等等对美国经济带来的越来越严重的破坏作用；不稳定的日趋缩小的国外市场和穷于应付的国际支付差额的沉重压力；所有这些都正在为美国爆发一次新的经济危机装上火药。由此可见，所谓“美国福利国家”的经济前景，不是如汉森所幻想的什么“持续繁荣”和“稳定成长”，而是日益面临着内有脓疮溃裂外有火山爆发的危险动荡局面。

四、美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需要的不是“福利国家”而是 社会主义，不是凯恩斯主义而是马克思主义

当代“福利国家”的谬论和实践是为垄断资本统治服务，加强剥削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欺骗手法。这种谬论的鼓吹者是以宣扬“阶级合作”、“阶级和平”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宣扬“超阶级国家”和资产阶级“民主”来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捏造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计划调节”来抵制社会主义；用“经济利益”的糖衣来麻痹工人阶级争取彻底解放的革命斗志。但是资本主义总危机日益深化的无情现实有力地驳斥了这一谬论，“福利国家”不但没有把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从贫困和失业的深渊中挽救出来，而是使他们越陷越深。每当垄断资产阶级关于“全民福利”的欺骗口号叫嚣得越高的时候，工人阶级就感到自己脖子上的枷锁越加重。正如列宁教导的，“工人们认识到改良主义是个骗局以后，就

利用改良来发展和扩大他们的阶级斗争”^①。

汉森说什么“作为福利国家重要组成部分的健全的劳资关系”已经使“阶级斗争成为过去”，这只不过是坐在火山口上的痴人说梦。肯尼迪虽然玩弄欺骗和法西斯镇压的两面手法，力图削弱工人运动，但在他上台以后的两年内，美国工人罢工次数仍然达到六千九百多次，参加罢工的人数达二百七十万人。美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新觉醒，还特别表现在占美国人口11%的黑人反对压迫、歧视、争取自由和平等公民权利的波澜壮阔的斗争方面。毛主席在《呼吁世界人民联合起来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的声明》中指出，“美国黑人斗争的迅速发展是美国国内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日益尖锐化的表现，……万恶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是随着奴役和贩卖黑人而兴盛起来的，它也将随着黑色人种的彻底解放而告终”。

当然也应该看到，由于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条件和比较有利的剥削条件，使过去美国工人运动的革命彻底性和团结一致方面受到某些不利的影响。例如美国殖民时代掠夺西部土地的所谓“西进运动”，美国南北战争以前的种族奴隶制以及至今存在的种族歧视，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垄断资本的大发战争横财等等，都使美国工人运动的发展甚至落后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这就有可能使美国垄断资本家通过他们的政治代理人、御用学者、被收买的右翼工会的上层分子，来鼓吹什么“美国例外论”，美国的“新资本主义或进步的资本主义”，“不是马克思，而是福特”的“美国生活方式”，“人民资本主义”以至“全民福利国家”。这些邪说谬论力图把美国工人运动从政治斗争引向经济主义，使工人阶级提高生活水平的希望寄托在美帝国主义向外扩张奴役世界的战争景气上面。近几年来，美国现代修正主义者也更加暴露了他们的反动面目，和垄断资产阶级的御用学者如汉森之流唱起了合台戏。汉森等向工人们宣传用凯恩斯主义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现代修正主义者跟着无耻地主张用“福利国家纲领”来代替社会主义斗争纲领。

但是不管这些“美国生活方式”的吹鼓手们和修正主义者怎样卖尽了力气来吹奏阶级合作的调子，美国工人阶级的新的觉醒已经表明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从切身痛苦的体验更加懂得列宁在1918年就告诉过他们的话，“美国革命无产者目前担负着一个特别重要的使命，就是要毫不调和地反对美帝国主义，反对这个最后参加资本家为瓜分利润而进行的世界大屠杀的最新最强的帝国主义”^②。当然，他们也会更加亲切而深刻地领会到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关于世界革命的科学论断：“历史经验证明，西欧和北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要取得彻底胜利，必须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结成紧密的同盟，必须同修正主义派划清界限，坚决肃清他们的影响”^③。

“要马克思主义，不要凯恩斯主义和修正主义；要社会主义，不要福利国家！”已经有美国有觉悟的工人阶层中和革命的人民中发出日益响亮的呼声。随着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新的觉醒，“我们相信，在西欧和北美这些资本主义的发源地和帝国主义的心脏地区，由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和斗争的发展，大搏斗的伟大日子，终有一天会要到来”^④。

① 《马克思主义和改良主义》。《列宁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版，第372页。

② 《给美国工人的信》。《列宁全集》，第28卷，第43页。

③ 《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红旗》1963年第20期。

④ 同上引。